

新时期作家谈创作

彭华生 钱光培 编



I054/15

新时期作家谈创作

彭华生 钱光培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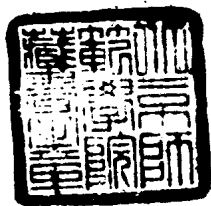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2284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书名题字：毛承志

新时期作家谈创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1}{8}$ 插页 2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600

书号 10019·3528

定价 1.50 元

目 录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	刘心武 (1)
《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及其他	茹志鹃 (10)
《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	蒋子龙 (24)
关于《日记》的断想	蒋子龙 (34)
《李顺大造屋》始末	高晓声 (39)
且说陈奂生	高晓声 (48)
木屋, 古老的木屋	古 华 (54)
——关于《爬满青藤的木屋》	
写人民之所爱	陈世旭 (59)
——《小镇上的将军》创作的一点感想	
同父老乡亲们共呼吸	何士光 (64)
——写《乡场上》的一点体会	
让它生长	张抗抗 (68)
——关于《夏》的写作	
《丹凤眼》点滴	陈建功 (73)
丝丝缕缕话《心香》	叶文玲 (78)
为“小人物”立传	张石山 (82)
——回顾《鐮柄韩宝山》的写作	

从生活中发掘新的人物关系 闰 水 (87)

——《竞争者》写作的前前后后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韩少功 (93)

惨淡经营 张 弦 (98)

《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 邓友梅 (103)

积累·发掘·构思 赵本夫 (107)

——回顾《卖驴》的形成过程

写民族之魂 王润滋 (112)

——《内当家》创作断想

关于《受戒》 汪曾祺 (118)

感受·理解·表达 王安忆 (123)

《天云山传奇》创作札记 鲁彦周 (132)

题外的话 叶蔚林 (137)

——关于《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我是一个土著 刘绍棠 (142)

我写《祸起萧墙》的得与失 水运宪 (148)

关于《甜甜的刺莓》 孙健忠 (154)

关于《土壤》中人物的探索及其它 温小钰 (159)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 周克芹 (166)

我是怎样写《东方》的 魏 巍 (175)

《李自成》创作余墨 姚雪垠 (191)

关于《将军吟》的创作 莫应丰 (205)

我的歌 李国文 (210)

——谈《冬天里的春天》的写作

闲话《芙蓉镇》 古 华 (217)

二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	丁 玲 (226)
创作漫谈	刘 真 (240)
我的创作体会	方 之 (246)
创作思想随谈	高晓声 (257)
作家素养三题	孟伟哉 (264)
创作与生活	从维熙 (276)
深入生活的核心是认识生活	张笑天 (292)
军人·历史·诗情	王愿坚 (299)
写作工业题材的一些感受	韶 华 (316)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马 烽 (326)
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	浩 然 (332)
和青年作者谈小说	彭荆风 (340)
漫谈短篇小说的创作	王 蒙 (347)
谈谈塑造人物	李 准 (370)
小说构思随感	林斤澜 (388)
谈怎样结构长篇小说	叶 辛 (399)
漫话情节	陆文夫 (408)
议论作品里的“议论”	王若望 (414)
论风格	王 蒙 (431)

三

漫谈“格调”	秦兆阳 (439)
——答蒋子龙同志	

贵在质朴峻 青 (450)

——答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透过弥漫的硝烟徐怀中 (457)

——答陈骏涛同志

关于《春之声》的通信王 蒙 (463)

答木令耆女士从维熙 (469)

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宗 璞 (474)

与其冒烟，不如燃烧金 河 (476)

心灵和肉体的变化张贤亮 (480)

——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

思想境界及其它叶蔚林 (486)

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倾向冯骥才 (492)

下一步踏向何处？冯骥才 (497)

——给刘心武同志的信

写在水仙花旁刘心武 (503)

——复冯骥才同志

编余碎语彭华生 钱光培 (509)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

刘 心 武

“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那些年里，他们也曾抛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文章，明为宣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则篡改《讲话》。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讲话》论述得一清二楚。写作品要从生活出发，本已成为无需争论的常识。但是，“四人帮”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推行“主题先行”、概念出发，流毒极深，贻害至今。不是吗？现在还常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内容是反映同“四人帮”斗争的，而创作路子却仍是“四人帮”“主题先行”、概念出发那一套。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重新学习《讲话》中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真正从生活出发，写出无愧于新长征时代的好作品。

在新长征的文化队列中，我是一员新兵。思想水平、生活功底、艺术修养、写作技巧几方面都很不足。我写的作品，发表出来能引起较多读者注意的，目前也仅仅是《班主任》这样一个短篇。

《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编辑部和我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些情意真挚的来信不但有赞扬与鼓励，也坦率地对《班主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从读者的反应中我体会到，从生活出发的东西人们就喜欢，从概念出发的东西（哪怕从正确的概念出发）他们就厌弃。

不少读者热情地肯定《班主任》“写得真实”、“摆脱了帮味”，“能使人想到身边的人和事”、“感到亲切”。为什么我以前发表的作品不能获得这样的评价？仔细想来，关键在于以前或多或少总是有点从概念出发，而《班主任》却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来构思的。

倘若从概念出发，《班主任》一定会是另外一副面貌。先定下个主题——歌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主题先行”后，便来设置人物。“一号人物”不用说是个优秀的班主任了。“对立面”呢？或者安排个破坏教育革命的“四人帮”爪牙，或者安排个持错误观点的落后教师。“中心事件”呢？倘若选定“接收小流氓”，那么，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矛盾冲突”便围绕着好老师要挽救小流氓，而“四人帮”爪牙却教唆小流氓来展开；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矛盾冲突”则围绕着好老师耐心，而落后老师急躁来展开。在“一号人物”旁边要陪衬上一两个好学生，在“对立面”左右则要安置一两个糊涂虫或和事佬。“高潮”要挖空心思搞个突发性场面（火灾？斗殴？车祸？……）最后当然是“正胜邪败”的“大团圆”结局。不过，还得让“一号人物”说几句“斗争还没结束”一类的话，以示作品的“深度”。显然，这样的创作路子，仍是“四人帮”“三突出”的那一套。这是一条创作上的死胡同。以“帮味”反“帮”，不但会败坏读者的胃口，而且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班主任》是我挣脱“主题先行”的枷锁的产物，它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它的主题不是事先拟定出来的，而是无数在我心中时时拱动的生活场景，大量牵动我感情丝缕的人和事，经过多次交融、剪裁、提纯、冶炼……直到构思接近完成时才初步凸现，而且直到写成后才明确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形象思

维的过程。

我在中学担任过十几年的班主任。对“四人帮”破坏教育战线的累累罪行，我有切肤之痛，心怀深仇大恨。揪出“四人帮”后，我常常思索：中、小学这种最基层的单位里，并没有多少直接同“四人帮”一伙挂钩的黑爪牙，为什么受灾的程度并不比某些被“四人帮”爪牙直接控制的单位轻呢？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摧垮“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帮派体系虽然至关重要，却仅仅是拨乱反正的一个前提。我们还必须花大力气批判“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散布的种种谬论，努力肃清那些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渗进并玷污了不少师生灵魂的“帮毒”，才能切实按毛泽东思想体系整顿好学校。许多我教过的学生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失眠，令我深思。其中就有石红、谢惠敏、宋宝琦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应当怎样引导他们从现在的起点向前迈进？……丰富的生活素材经过反复的咀嚼、消化，精华便逐步浓缩成了艺术构思——我要写出“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我要满腔义愤地告诉读者：不要仅仅注意到张铁生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丑类，还要注意到宋宝琦式的畸形儿，更要注意到反映在谢惠敏这类青年学生身上的问题！一位业余作者对我说，反映前几年“四人帮”对学校的破坏，如果仅仅是站在校门口粗粗一望，那么，诉诸文字也不过是写写破烂的门窗、混乱的秩序；倘若能再进去转转，那么，便不难发现宋宝琦一类学生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也不难在作品中塑造出这一类形象；但只有真正在学校里进行长时期的观察、体验，才能敏锐而准确地向读者提供出谢惠敏这样的形象。我很同意他的分析。我在学校工作时，谢惠敏这样的学生给我带来了最多的思虑，激起了我最强烈的痛惜与切望相交织的复杂感情。我总

觉得他们这类青少年的进一步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祖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因此，我在写《班主任》时，才没有停留在提出和勾勒宋宝琦的形象上，而是把笔锋深入到了更严峻的问题，以诚挚的态度向读者提供了谢惠敏这样一个在以往小说中似乎还不多见的形象。对生活的熟悉、理解程度，决定着人物形象的独特美学价值即典型化程度，因而也就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在构思中，我除了用“过电影”的方式反复酝酿学生形象外，脑海中还接二连三地涌现出许多老师的形象。我熟悉他们，热爱他们。其中不少优秀的班主任更是我钦慕的榜样。人们常常说到教师的辛勤、耐心、细致、以身作则，却很少深入到教师的内心，很少去发掘他们那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那种强烈的、以特有的形式酝酿与爆发的爱和憎，那种心灵的美。于是在我的构思中，一位概括了我所体验到的革命教师的人格美与心灵美的班主任形象，便在一九七七年春天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逐渐清晰、丰满、凸现出来了，这便是张俊石这个人物的诞生。后来我又从生活中提炼出了尹老师的形象。在小说中，宋宝琦、谢惠敏、尹老师都和张老师有矛盾，但他们都不是张老师的“对立面”，对立面是“四人帮”，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愚民政策。不少读者把小说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句话认作是这个短篇的主题。我觉得可以这么来看。但我并不是先有这么个警句然后再来定人物、编故事。说实话，这个句子是直到我写那一段时，才一下子蹦了出来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句式，为什么能打动读者？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因为整个小说是从生活出发的，读者被有生活实感的人物和场景吸引住了，因此在看到这个句子时并不觉得突兀，而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一些读者来信问：你说《班主任》里的人物形象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这个我懂，但究竟有没有具体的模特儿？我想，塑造艺术形象，总是需要具体的模特儿的。所谓提炼、概括，不能理解成仅仅是分析共性，即便写历史小说，作者在构成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时，恐怕也必得从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活人身上，汲取某些性格、气质、外貌、行为、风度方面的养料，也就是说，仍然不能仅仅从资料分析上去概括共性，仍然需要具体的模特儿。当然，模特儿或者以一个为主，或者综合数人而用之，照搬照用一般是不适宜的。有的读者去猜测《班主任》中的人物是否即某某中学的某某某，那是没有意义的。《班主任》中的人物形象固然有模特儿，但大多是综合数人而用之，并且也非简单地各取一点或数点拼凑而成。我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以朝典型化高度攀登为目标，提炼、熔铸，很花费了一番气力。比如张老师这个形象，为什么要塑造成这个样子？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同我议论过。他说自己也曾打算写一篇歌颂园丁的小说。他按这样的思路设计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因为读者们对“女的好，女的都是党代表；老的坏，老的都是走资派”的“帮味”公式极端厌弃，所以确定主人公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教师。因为要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所以确定他的面貌是“浓黑的剑眉，深邃的目光”……我问他：“在生活中，是否有几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他摇头。又问他：“你觉得你熟识的人当中，谁的眉毛称得上是‘剑眉’，谁的目光常给你‘深邃’之感呢？”他又摇头。原来他写这个人物并没有模特儿，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仅是出于一种“反‘四人帮’之道而行之”的愿望，以及“英雄必得相貌堂堂”的概念。我告诉他，我塑造张老师这个形象时不是这样考虑的。我脑海里涌现出来的首先不是概念，

而是活生生的人。在中学里，老教师固然令人可敬，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也着实可爱，但真正承担最大工作量、整天在第一线钉着干的，还大多是毕业于“十七年”的“旧学校”、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他们工资不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在红旗下长大成人，却也被林彪、“四人帮”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每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教育战线激烈交锋时，他们总处在风暴、漩涡的中心，“四人帮”感到最不放心、最“危险”的，也正是他们这种“三、四十岁的人”。我眼前呈现出他们熟悉的身影，耳边回响着他们亲切的语音，而且，我感到自己的脉搏也随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而跳动，因此，我感到必须把他们写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努力在张老师这个形象中，把他们当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我又从最熟悉的几位教师身上，提炼出了张老师的外貌、风度，以及那连手绢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生活习惯。从生活中的活人出发，以个性体现共性，这应当是我们塑造人物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人物要从生活出发，情节也要从生活出发。这当然不是说，作品的情节应当一律是生活中实际发生过的事。有人问我：《班主任》中写到的“《牛虻》事件”和读《表》的情节，生活中是否实有其事？可以肯定地回答：生活中并没有这样两个现成的事件供我拈取。这两个情节是虚构的，但并非瞎编。“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否定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可谓多矣，我为何单拣出《牛虻》作例？严格地谈，《牛虻》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占什么地位；但是，凡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度过少年、青年时代的读者，恐怕大都会对这本书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大量印行、大力推荐过这本书，它对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作品中的张老师面对着饱经沧桑的《牛虻》一书，从谢

惠敏、宋宝琦这两个品质绝然不同的下一代人口中，听到了相同的斥为“黄书”的判断，油然迸发出强烈的控诉之情，便显得真实、自然了。我把张老师设计为自己的同龄人，当年我和同伴们阅读、讨论《牛虻》的场景历历在目；我对“四人帮”扫荡包括《牛虻》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结晶的忿懑之情刻刻在心；我耳闻目睹的谢惠敏、宋宝琦这样的青年因中毒而无知的事例萦绕于怀……所以，经过一番概括、加工（丰富的想象力在这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便设计出了“《牛虻》事件”这样一个情节。倘若我没有这样的生活感受，凭空从概念出发去杜撰另外一个情节，恐怕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效果。读《表》的情节也是既从生活感受出发而又采取了虚构手段。我曾在“四人帮”几乎禁绝一切外国作品时，悄悄向学生讲过盖达尔《学校》一书的故事，收到了可喜的正面效果，因此，我坚信凡在历史上起过革命或进步作用的作品，总还是有或大或小的教育意义的，选择恰当的篇目针对适合的问题组织学生们阅读，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读《表》这一情节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

再谈谈高潮问题。有些读者对小说第七节——张老师在小公园中沉思——表示赞赏。有几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当他们读到这一节中张老师的内心独白时，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第七节确是全篇的高潮。我写这一节时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但是也有两位读者在来信中问：小说的高潮应当靠人物之间的激烈交锋和爆发性的强动作推上去，而你这篇小说的高潮却在几乎全然静态的无声场面中形成，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高潮的处理也应当从生活出发。我在构思中就考虑到，班主任这种工作的动作性不强，特别是富于戏剧性的强动作，简直一点也找不到。越过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去给学生补课，几年如一日接送

残废儿童上学、回家……这类特例生活中是有的，也可以提炼为典型意义的情节，并且比较容易作到在强动作中形成高潮，而且也已经有人试过。但是，小说不一定要向戏剧看齐（“四人帮”则要求一切艺术形式都要向戏剧看齐），并非离开了激烈的交锋、强烈的动作，就不能塑造出动人的艺术形象，形成令人心潮激荡的高潮（其实戏剧的高潮也未必一定要通过直接交锋与强动作来完成）。这篇小说里的那些情节，以及高潮的安排，都是从中学班主任的日常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光明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张俊石，他在一九七七年春天的那个下午，也无非是干了那么几件毫不惊险、平淡无奇的事儿。怎样才能显示出平凡中的不平凡，使人物具有感人的光彩呢？怎样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推向高潮呢？我决定废弃那种用一般化的外在动作去表现教师工作勤恳、耐心细致的手法，而是在采用尽可能精细的白描的同时，放手去展示张老师那由革命激情支配的深刻而丰富的心理活动，用以体现他善于按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体现他摒弃形而上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所达到的水平，以及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对祖国未来、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在第七节里，我努力展示张老师那江河奔泻般的爱憎、思考，使之形成了全篇的高潮。这种作法，按“四人帮”的标准衡量，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广大读者接受了这一特别的处理方式。实践证明，小说与戏剧的确有所不同，是完全可以别辟蹊径去结构高潮的。而要想使高潮真正掀动读者的心潮，关键还在于要从生活出发，准确、深刻地表达出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不从生活出发，任凭你呼风唤雨、大轰大嗡、要死要活、耸人听闻，终究是不中用的。

有一些读者认为《班主任》的结尾不过瘾。为什么不写出谢惠敏、宋宝琦的转变？有个读者给我寄来了改换结尾的具体方

案——加第十节，写一周后宋宝琦经过耐心教育幡然悔悟，而谢惠敏读了《牛虻》也便茅塞顿开，于是初三（三）从此书声琅琅、齐步前进。这位读者的热心令我感动，而意见却不敢苟同。道理很简单，就是生活本身虽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但却远未完全解决宋宝琦和谢惠敏身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作者不能从概念出发，去编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医治“四人帮”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伤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是积重难返，困难还多，成效初见，却尚未臻胜境。小说以张老师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作结，似乎更能给读者以余味，促使读者去进行再创造。

报刊在评论《班主任》时，肯定它是百花园中的一朵香花。仔细想来，这篇小说如果不是根植在生活的泥土中，也只能是纸花、绢花、塑料花。有根花才香，有根才有生命力。我愿永远遵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作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争取写出新的好作品来。

《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及其他

——在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上的讲话

茹志鹃

编辑部给我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让我谈谈《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经过；还有一个是同志们感到很苦恼的问题，生活中很动人的东西，写出来不那么动人。我就谈谈这两个问题。

先谈《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经过。

这个作品的最初意念是比较早了。最初的意念是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感受到的，在为老干部、知名人士落实政策的热闹声浪中，想为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心灵讲讲话；另一方面，我到了大庆后，草原，以及生活在草原上的青年男女，他们的生活、恋爱也对我有吸引力。我就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想写一个东西，还是在给错划的右派改正的政策没有出来之前。后来，在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过程中，我看到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干部，当“四人帮”压他的时候，他感到难过，痛苦，“四人帮”打倒后，他也大声疾呼着“四人帮”如何专制，如何残酷，而当他一旦解放了，要他来解放人家，于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呀！”“思想上想不大通啊！”甚至保留意见。为什么？因为当时正是他搞了人家，是他压了人家，现在要改正就说明他并不是一贯正确，于是就不那么干脆，不那么痛快。这给我一种感受：一个人根据环境位置的变化而在变化。到了去年十月份，我去大庆，在采油队住了几天，我